

陶淵明詩略

李文初著



装帧设计：杨白子
责任编辑：谢凡

257

古典文学研究丛书

陶渊明论略

李文初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.375印张 1插页 164,000字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500册

书号10111·1470 定价1.95元

序

芦 荻

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别具气格、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伟大诗人，他留下的诗文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中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对后世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自钟嵘以下，历代论者，对其人其诗，都曾予以高度的重视。建国以来，学术界对陶渊明的研究，更是盛况空前。

文初同志向治先秦汉魏六朝文学，他把近年来关于陶渊明的论著汇集成册，题名《陶渊明论略》，即将付梓。闻讯之下，不胜喜悦。我与他共事多年，契结文字，对他治学谨严、实事求是的作风，印象极深。这次得先读其文，深以为快。风雨鸡鸣，益增切磋之感！

这本论集，收入文章十一篇，内容颇为丰富。虽非全面、系统地介绍陶渊明及其作品，但各篇之间还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。其中，作者对历来一些有争议的问题，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并有独到之处。作者向来主张，要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，必须打破陈规，扩大视野，开辟新的蹊径。本书即用实际行动体现了这一良好愿望。概括起来，

全书内容大致包括五个方面，兹略作介绍如下：

第一，属于考据订正的，有《关于陶渊明生平的几个问题》、《陶渊明的思想分期与陶集诗文系年》、《读〈诗品·宋徵士陶潜〉札记》等篇。作者详考史实，剥垢磨光，对过去某些聚讼纷纭的问题，能据实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。比方，关于陶渊明的生年，作者力排众议，独推梁任公之说（公元372年），并新添许多证据，进一步完善梁氏这一创获。又如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》一诗，自李善始，注家多主“镇军”为镇军将军刘裕；本书作者用大量事实否定这一陈说，认为“镇军”为镇北将军刘牢之的说法（清人陶澍首倡此说）是正确的。这些论说，虽属少数派意见，但说得有理有据，令人叹服。

第二，属于论述陶渊明思想的，主要有《论陶渊明之“隐”》、《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时代思潮》两篇。一方面，作者紧紧扣住陶渊明现存诗文来谈，一方面，又将陶渊明放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上，联系魏晋时期玄、佛、道（教）三家思想，进行比较研究，分析精细，挖掘深广，触及到一些新问题，读后颇觉新鲜。谈到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和性质，这原是人们研讨已久的问题了，但作者仍能不拘陈说，提出自己的见解。如说陶渊明弃官而不弃世，与当时那些欺世盗名的种种假隐不可同日而语；倘说他归田躬耕也是一种“隐”的话，那这种“隐”只能属于“心隐”的性质，即因内心苦闷至极而渴求某种精神解脱。其中，分析陶诗“心远地自偏”一句，甚有新意，便是陶渊明“心隐”的确切证明。

第三，陶渊明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，无疑是在田园诗的

创作上。如何正确估量这些作品的价值，直接关系到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这个问题，向来意见纷陈，人们轩轾抑扬，几至悬若天壤，其中原因，往往就在对这些田园诗的不同认识上。《陶渊明田园诗的评价问题》和《陶谢诗的比较研究》两篇，正是针对这种研究状况而发的。文中指出，陶渊明的田园诗，不仅吟诵了他的田园生活的乐趣，而且反映了他不能忘怀世事和个人不幸遭遇的苦闷和激愤。这些诗表面恬淡、平和，其实深蕴着一个并不“静穆”的灵魂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，是我们研究诗人的思想变化发展，认识当时社会本质的可靠依据。文章十分强调这些作品在诗歌题材的开拓上，在抒发感情的曲折微妙上，在诗歌语言风格的创新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并从出身、教养、生活道路、美学情趣诸方面与开创山水诗派的谢灵运进行对比，从而论定陶高于谢是历史的必然结论。

第四，着重谈陶诗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特征的，有《陶诗与魏晋玄风》、《陶诗的理趣》、《陶诗的浪漫主义》等。陶诗极富意境之美，风格自然淳朴，且具丰富而含蓄的哲理味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作者着重探究这些现象的历史联系，从中窥视魏晋时期我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动向，指出陶渊明的诗，同王羲之的字、顾恺之的画，都是当时明显体现美学发展新观念、新趋势的杰出代表。陶渊明生活在玄风炽盛的时代，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仍风靡诗坛。他能突破玄言诗的僵局，将诗歌从套用玄言名理的困境中解放出来，恢复诗歌的形象性和抒情性，并在诗歌与哲理的巧妙结合上开拓出一条

新路，为我国哲理诗的健康发展作了有益的尝试。至于陶诗的浪漫主义，近年来已有专论研究，本书作者不否认陶诗存在浪漫主义，但认为陶诗的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精神气韵上，表现在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追求上，而具体表现手法，则与浪漫主义大师们通常采用的虚构幻境和夸张的情形有别，从描写的“细节”上看，它倒是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。况且，陶诗的浪漫主义激情常常隐伏在一种平和恬澹的气象之下，容易被人忽略。这些看法，都很符合陶诗的实情。

第五，《陶渊明及其创作的历史评价》一文，据我所知，作者是花了很大力气来写的。这篇文章，目的在于考察陶渊明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，并从历代论者的不同评价中探究其中的种种原因。南北朝时期，谢(灵运)高于陶，到了唐代，陶谢并肩。杜甫晚年视陶为文思敏捷，善作惊人之语的高手而深表崇敬，郑谷更以陶诗为师法的典范，有云“只应陶集是吾师”。这些都说明陶诗对唐诗的影响，也证明陶渊明的地位确实是上升了。迄宋以后，陶高于谢，成了历史定论，苏轼之论固不待言，陆游亦主张“学诗当学陶”，反映了宋人在诗道上宗陶的新观念。辛弃疾“更无一字不清真”一语，恰切地道出了陶诗真心率性、冲澹深粹、出于自然的独特风格，也说明自然本色之美已是宋人追求的最高美学境界。上述内容，作者能引证详尽，一一反映出陶诗影响的历史脉络。用这种方法阐明作家的历史地位，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，但也确实要付出辛勤的劳动。此外，作者对陶渊明坚持与当时统治阶级当权派决裂，积极探索人生理想的举动，

能从历史的比较中给予恰当的评价；指出陶渊明的创作正是这种生活实践的艺术再现，从而深化了对陶渊明人格及创作的认识。陶渊明的一生，为彭泽令不过八十余日，后即在田园中度过他的后半生，他不以荣辱得失而挠败其天真，为坚持理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。这些，都是这篇文章持论不俗的所在。

全稿读竟，深觉文初同志的笔非常开放。他从纵、横两方面开拓了陶渊明研究的领域，提出了不少新问题，发表了自己的独到之见，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。一般地说，论文要写得俊逸、清新、条畅是不容易的。文初同志生长在九嶷山麓，深受南楚文化和灵秀山水的薰陶，后又求学京都，曾在游国恩先生指导下攻读中国古典文学。这本专论的文风，明显反映出这些因素影响的痕迹。寄妙旨乎篇中，寓高情于笔下。我衷心推荐这本书给研究陶诗者一读，或当不以为过吧！

一九八四年三月于越秀山麓之芷屋

目 录

序	1
关于陶渊明生平的几个问题	1
论陶渊明之“隐”	22
陶渊明的思想与魏晋时代思潮	52
陶渊明的思想分期与陶集诗文系年	84
陶诗与魏晋玄风	115
陶诗的浪漫主义	139
陶诗的理趣	157
陶谢诗的比较研究	173
陶渊明田园诗的评价问题	199
读《诗品·宋徵士陶潜》札记	215
陶渊明及其创作的历史评价	229
后 记	255

关于陶渊明生平的几个问题

一、梁启超氏对陶渊明生年的论断

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丁卯(公元427年)，颜延之《陶征士诔并序》，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(以下简称颜《诔》、沈《传》)与渊明《自祭文》合，故迄无异议。至于享年几何？颜《诔》但云“春秋若干”，沈《传》明言“年六十三”。若据沈《传》推之，他当生于晋安帝兴宁三年乙丑(公元365年)。后来，怀疑沈《传》、更创新说的人多起来，主要的有张慎的七十六岁说(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，公元352年)，梁启超的五十六岁说(生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，公元372年)，古直的五十二岁说(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，公元376年)等。

就前人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，诸家说法各有一定根据，但比较而言，我以为梁启超氏在《陶渊明年谱》(以下简称梁《谱》)中的意见，论据最为充分，他提出许多前人没有注意的疑点，作了某些富有生气的考证，是陶渊明生平研究中难得的创获。

梁氏从陶集中钩稽出自述年纪的诗文凡十二处，提出证据八条，断定陶渊明享年五十六岁（公元372—427年）。

现将梁氏钩出的诗文，依次列举如下（为了便于说清问题，笔者将原引顺序略作调整）：

我年二六（十二），尔才九龄。（《祭程氏妹文》）

弱冠（二十）逢世阻，始室丧其偏。（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）

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。（《饮酒》之十九）

闲居三十载，遂与尘事冥。（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）

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（《归园田居》之一）

行行向不惑（四十），淹留遂无成。（《饮酒》之十六）

自我抱兹独，僵勉四十年。（《连雨独饮》）

总角抱孤介，奄出四十年。（《戊申岁六月遇火》）

开岁倏五十，吾生行归休。（《游斜川》）

奈何五十年，忽已亲此事。（《杂诗》之六）

吾年过五十。（《与子俨等疏》）

结发念善事，僵俛六九年。（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）

梁氏据此作了以下辨证：

（一）梁氏说：“先生自十二岁至五十四岁之事迹，既屡见于诗文中，若寿过六十，不应无一字道及。（若谓先生晚年废笔札，则殊不然。《挽歌》及《自祭文》，皆属纩时所作也。……）”

梁氏此说，初看似嫌武断，细按又觉不无道理。渊明诗文题年月固属偶然，但言及年纪之处，往往语多感慨。《论语·为政》载孔子语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这是封建时代人们进德修业的几个重要阶段，为一般士人所铭记。陶渊明留下的诗文，六十以前几个阶段都提到了，这与他一生坎坷有关，大概每到此种关键岁月，都会激起他对已逝年华的喟叹，“夫导达意气，其为文乎！”（《感士不遇赋序》）他正是有所感才借诗文抒发这类逝川之叹的。然而，在他现存的诗文中，唯独不见“耳顺”之年的字迹，难怪梁氏对沈《传》要表怀疑了。

（二）梁氏说：“《与子俨等疏》，玩词意当是遗嘱，而仅云：‘吾年过五十’。”

有人认为，《与子俨等疏》不必看作遗嘱，即便为遗嘱，也不一定是属纩时所作。细按此疏内容，确为遗嘱性质，是陶渊明抱病以来，“渐就衰损”，自知“大分”有限，年命将终时写成的；不然，这篇训诫儿辈的文章就不会一开头就说“天地赋命，生必有死，自古贤圣，谁能独免”这样的话了。再说，陶渊明晚年抱病孤村，子俨等本在身边，若有什么话要说，完全可以当面训示，无须形诸文字；他要将这番训诫之意以“疏”的形式严肃地写下来，为的是让儿辈永远不忘父教。这种做法，不将“疏”视为遗嘱，是很难解释清楚的。当然，说它不一定是属纩时所作，也有这种可能；但写遗嘱与属纩之间决不会相隔太久。这篇遗嘱性质的“疏”，可能与

《挽歌诗》(三首)写于同时，诗的开首也是“有生必有死”这样的话。

再据有的学者考证，《疏》中有“济北汜稚春，晋时操行人也”之语，既称“晋时”，说明命笔时已属刘宋，因知此《疏》必作于晋亡之后。按沈《传》宋武帝永初元年(公元420年)，陶渊明已五十六岁，而他写这篇“疏”，只能在永初二年至景平元年这三年中；不然，再往后就不是“年过五十”，而是年届六十了。况且，按照汉语的传统习惯，“过五十”一般是指五十出头；若五十七八岁，习惯上就说年近六十了，所以，陶渊明写作此文必在五十五岁以前。若以梁氏推断的生年(公元372年)计，宋永初元年陶渊明四十九岁，死时五十六岁，“年过五十”必在永初三年(公元422年)至元嘉四年(公元427年)之间，其中任何一年都可称“年过五十”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梁《谱》的五十六岁说比沈《传》的六十三岁说显然要合理得多。

(三)梁氏说：“《挽歌》云：‘早终非命促。’若寿六十三，不得言早终。(先生为其外祖孟嘉作传，传文云：‘年五十’。赞云：‘道悠运促，不终远业。惜哉！仁者必寿，岂斯言之谬乎？’是以仅过五十为短命也。其对于自己则达观，言虽早终而非命促尔。)”

朱自清先生评梁氏此说“颇言之成理”^①。《庄子·盗跖》云：“人上寿百岁，中寿八十，下寿六十。”古时人们习惯上

^①见《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》。

称六十岁以上的人为有寿。人过六十而死，可谓寿终正寝，享尽天年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叫做符合自然规律的正常死亡。因此，在魏晋人写的哀诔墓志中，凡年过六十者，绝无叹其“早终”的。曹植《王仲宣诔并序》中有“谁谓不庸，早世即冥”、“如何奄忽，弃我夙零”等话，“早世即冥”、“弃我夙零”就是痛惜王粲“早终”之意，因为王粲死时年仅四十一岁。曹植在《文帝诔》中说曹丕“早世殒丧”，这话当然也是叹其“早终”（曹丕死时才四十岁）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战乱不已，人命朝露，人口死亡率很高，所谓“数年之间，零落略尽”^①。上层人士在才气上显得早熟，在体质上则趋于早衰，一般人活到四五十岁已属不易，能进入六十高龄的人是不多的。如果陶渊明真的活到六十多岁，在当时可谓得天独厚，还有什么理由叹恨“早终”呢？

（四）梁氏说：“颜《诔》云：‘年在中身，疢唯痞疾。’此用《无逸》‘文王受命惟中身’成语，谓五十也。若六十以外，不得言中身。”

按《尚书》伪孔《传》云：“文王九十七而终。中身即位，时年四十七。言中身，举全数。”又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孔颖达《疏》引郑《笺》云：“中身谓中年。”颜《诔》的原话是这样：“年在中身，疢维痞疾，视死如归，临凶若吉，药剂弗尝，祷祀非恤，僚幽告终，怀和长毕。”这几句话是一气贯通，叙说陶渊明中身染病而致死这件事，证明他确在中年殒命。朱

①曹丕：《与吴质书》。

自清先生说梁氏“此证甚坚”，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还无法攻破。潘岳《夏侯常侍诔》云：“曾未知命，中年陨卒。”夏侯湛卒年四十九，说明四十多岁在当时称“中年”。李兴《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巨平成侯羊公碑》云：“如何不吊，中年殒□。”羊祜死于咸宁四年十一月庚寅，享年五十八，证明晋时五十岁以上，六十岁以下亦称“中年”。在魏晋人的笔下，不见六十以上称“中年”者。看来，魏晋人说的“中年”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大体一致。陶渊明生前友好颜延之说他“中年”丧生，应该说是可信的。

(五)梁氏说：“《游斜川》一诗，《序》中明记‘辛酉正月五日’；又云：‘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’。而诗发端一句为‘开岁倏五十’。则辛酉岁先生行年五十，当极可信凭。”

这一条是梁氏证成陶渊明得年五十六的根本。《游斜川并序》素有异文，但较早的宋本作“辛酉正月五日”、“开岁倏五十”，应该说是可信的。后人执迷沈《传》，遂妄改“辛酉”为“辛丑”，“五十”为“五日”。这种妄作解人的行径，实在是弄巧成拙。因为序中明言“各疏年纪乡里，以记其时日。”说明诗中必有“时日”(年、月、日)和作者“年纪”的记载。“辛□”(年)、“正月”(月)、“五日”(日)即“时日”，若作“开岁倏五日”，全诗及序不及作者“年纪”，这是与序文交代不符的。其二，诗云“开岁倏五日”，序文已有“正月五日”，明显犯复。其三，“开岁倏五□，吾生行归休”即序文所谓“悲日月之遂往，悼吾年之不留”，是慨叹年华易逝的。“吾年”即“吾”之“年纪”，“五日”乃指具体的五天，“日”不是“年”的概念。一

年过了“五日”有什么值得悲悼呢？只有作“开岁倏五十”才既切“吾年”的语义，又在情思上真正触动作者的心弦。其四，若此次游斜川在辛丑岁（公元401年），即便以沈《传》生年推算，该年渊明也不过三十七岁（据梁《谱》则为三十岁），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，怎么会发出“吾生行归休”之类忧生畏死之嗟呢？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连那些信从沈《传》的人也不敢附和“辛丑”之说，他们采取折中的态度：取宋本之“辛酉”而去其“五十”，取俗本之“五日”而去其“辛丑”。殊不知如此，同样不能自圆其说（上面已经指出）。

总之，“五十”既定，后人妄改“辛酉”之谜也就被彻底揭穿，沈《传》六十三岁之说亦因之岌岌可危；因为，若依沈《传》，陶渊明辛酉岁已经五十七岁了，而依梁《谱》则正好五十。梁氏其他考证都只能说明陶渊明的卒年必在五十以上、六十以下的大范围内，这一条可谓一槌定音，终于将其卒年具体定在五十六岁上。

（六）梁氏说：“‘闲居三十载’之诗，题中标明‘辛丑岁七月’，与辛酉之五十正合。”

梁氏举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诗开首二句“闲居三十载，遂与尘事冥”，再次证明陶渊明生于咸安二年；只有出生于这一年，辛丑岁才是三十岁。或疑“闲居”而从落地算起，于理难通。严格地说，这样算法确实不大合理。但我认为既然是诗，这种地方就不必过于拘泥，他既不是说从辛丑岁起才开始出仕，也无须考虑究竟“闲居”从何时算起。“闲居三十载，遂与尘事冥。诗书敦夙好，园林无世

情。”这四句诗不过说明他对出仕前那段家居田园生活（约莫三十年时间）十分留恋罢了。梁氏将“辛丑”与“三十”联系在一起，无异于说陶渊明辛丑岁才开始出仕，这与他认定“始作镇军参军”为“始仕”（隆安二年戊戌，公元398年）之说是矛盾的。这是他的疏忽处。

（七）梁氏说：“‘奄出四九年’之诗，题中标明‘戊申岁六月’。时先生年正三十七。”

“奄出四九年”原作“奄出四十年”。按梁《谱》生年推算，戊申岁陶渊明年仅三十七，与“奄出四十年”不符，故梁氏妄改“四十”为“四九”，这是不足取的。但据陶澍《靖节先生年谱考异》称，《江州志》引此诗作“戊午”（公元418年），若据此按梁《谱》推算，戊午那年陶渊明当为四十七岁。从开始“总发”（约莫七八岁）之日起，再加四十年，基本与四十七吻合。

（八）梁氏说：“先生作令彭泽旋复弃官，实义熙元年乙巳事。年月具见《归去来兮序》。时先生年三十四也。《饮酒》诗‘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。遂尽介然分，拂衣归田里。’即叙此事。若先生得年六十三，则彼时已逾四十，不应云‘立年’。”

梁氏这段话，前面说得还有道理，后面对“是时向立年”句的理解则欠斟酌。首先，“向立年”不就是“立年”。若依梁氏之说，“是时向立年”等四句乃叙归田事，那么陶渊明归田之时当不足三十岁，这与梁《谱》三十四岁归田之说正相抵牾。这是梁氏又一个不应有的疏忽。其次，梁氏对《饮酒》之

十九的理解不确切。原诗说：“畴昔苦长饥，投耒去学仕，将养不得节，冻馁固缠已。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。遂尽介然分，终死(一作“拂衣”)归田里。……”这段文字是回顾往事，概述他归田前的生活、思想变化过程，诗中显然有着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时间概念：“畴昔”——“是时”——“遂”。“畴昔”叙他出仕的动机和遭际；“是时”叙他对仕宦生涯的感受；“遂”是说他后来如何下决心归田。“遂”与“是时”之所以有前后之分，是因为并非一懂得居官可耻的道理就马上拂衣归去，始明道理到付诸行动，其间必有一段时间距离。若这样理解，梁氏说陶渊明三十四岁归田就说得通了。

以上对梁启超氏的八条论据，按现有材料进行了初步验证，从中可以看出，梁氏的意见多数是有说服力的，而沈《传》六十三岁之说，则疑窦甚多。据《南史·王僧儒传》说，沈约修《宋书》时，“伪状巧籍”，淆乱不堪；而该书又在匆忙中修成(历时不足一年)。因而颇多舛谬是并不足怪的。沈约修《宋书》时，距陶渊明逝世已经六十余年^①；名位卑微的陶渊明，不可能有什么材料流传下来，沈约很可能是根据某些并不确切的传闻，草率断定他活了六十三岁。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，梁氏的论断确实比沈《传》的说法为优。

然而，梁氏这个论断在今天却殊受冷落，解放以来，几乎所有关于陶渊明的正式出版物都取沈《传》生年，一般读者

^①沈约于齐永明五年(公元487年)受命修《宋书》，明年二月完成纪、传七十卷。